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赵逵夫 / 主编

《韩非子》的成书 及其文学研究

马世年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逵夫 / 主编

《韩非子》的成书 及其文学研究

马世年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马世年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赵逵夫主编)
ISBN 978-7-5325-5626-7
I. ①韩… II. ①马… III. ①韩非子—文学研究
IV. ①B226.55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5468 号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

马世年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5626—7

B·699 定价: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序

赵逵夫

在今日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条件下,应该对先秦文学与文化进行集中的、系统的、更深入的研究。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一般说来,距当今社会越近者,与当今社会的共同性越多,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便越大,借鉴意义也越大。但是,先秦时期既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它对后代在文学和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此后任何一个时代不能与之相比。

在学术领域的情形是,从古到今,有关这一段的研究最多(包括经学范围内的论著),但近代以来学者同古代人们的看法之差距却最大,而且近代以来学者之间争论亦最多,分歧也最大。读读《古史辨》以来的有关论著,便可以明白。至于文学史著作,先秦一段似乎只是同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并列的一个时段,同各朝分体论述的情形一样,大多分为《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四大部分,有的在前面加上“概述”或“原始歌谣与神话”,后面带上“秦代文学”。而事实上,就中国文明史言之,秦以前的一段同汉以后一段时间大体相等^①。先秦时代没有摄影、录音、录像设备,我们对先秦时两千年社会的认识,除了有关史书、诸子著作之外,一靠地下出土的材料,二靠当时留下来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仅是当时社会的反映,也是当时人们心灵的反映。一部文学史,便是一部心灵史。至今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观念,认为先秦时代没有纯文学。《诗经》

^① 秦朝从统一全国至灭亡,前后十六年,秦统一之前同之后的历史,无论人物、文件都很难截然分开,故虽然严格的“先秦”指秦统一六国以前的两千多年,但很多学术著作将秦代也附于战国之后。研究政治思想史者,则多将“秦汉”连接论述之。大体上根据研究的内容,各取其便。

中的三百多首诗难道不是纯文学？世界各个民族中，文学不同体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一般说来，诗歌都是产生最早的。我国西周末年宣王时代即产生了以召伯虎、尹吉甫、南仲、张仲为代表的中兴诗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群体，这也是很多学者未能想到的^①。

我们要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必须对先秦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各方面有一个科学、明晰的认识，既消除种种盲目信古的谬说，也克服一味疑古的心理与思想，从而对它们作科学的、更为细致的研究。

百年来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及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已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即使是“疑古派”学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也对我们彻底地清理理论场地、对不少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抛开各种旧说的束缚而从头做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文字资料，更使我们有可能弄清前人无法弄清的问题，纠正前人的某些错误，解决一些历史的悬案，补出某些历史的缺环。

我们的先民大约从公元前 3500 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在距今六七千年的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中已发现铜片）。在仰韶文化中期已出现中心聚落，表现出明显的阶段、阶层的差异，有的大墓葬中还有象征着权威、武力、生杀大权的玉钺。到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分化更为明显。如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出现了建筑规格甚高的原始殿堂^②。可见，当时已确立了强制性权力系统。而阶段或阶层的存在，强制性权力系统的确立，是国家形成的标志^③。炎帝族、黄帝族争战于阪泉，黄帝族、蚩尤族争战于涿鹿，以及颛顼、共工之战，实际上就反映了在一定王权之下，各部族间为扩大势力、争得更多生活、生产资源而进行的战争。当时的帝（部族集团的首领）或由各部族首领协商确定，或由上一任的部族集团首领提名确定。与由选举产生的制度相比，逐渐带有强制确定的性质，已为以后的世袭王权奠定了基础。《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

① 参拙文《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55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出版。学术界普遍以“屈宋”为最早的作家群体，其实屈原、宋玉并不完全同时。

②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第 197 页。

③ 同上，第 7 页。

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和《吕氏春秋·行论》有类似的记载^①。《韩非子》中言鲧因反对传于舜，尧“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并说时舜为“匹夫”，说明舜此前在部落集团中并无高的地位。尧为什么不顾其他首领的反对而一意传位于一个并无地位的人呢？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继位者完全听他的话，维护他的利益，包括他的声誉。而《史记正义·五帝本纪》引《竹书》，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或者是尧初言传于舜只是一个姿态，本意是要传于儿子丹朱，后来舜在培植了自己的势力之后强取之；或者尧虽打算百年之后传于舜，舜等不及，因而抢班夺权。总之，“尧舜禅让”乃是儒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改造了的历史，其实当时已开始了家天下的前奏。禹的宣言传位于益，而实欲传于子，表现得更为明显。《韩非子·饰邪》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一个部落的首领或曰酋长因朝会迟到而被杀，帝（君主）的地位如此之威严，其法令如此之峻急，则其个人与家族的势力到了怎样的程度，便可想而知。古代文献中说禹年老之后在部落集团会议上提出继承人的问题，大家推举皋陶，但皋陶早死。后又推举了益。其实这时推举帝的继承人在禹来说，只是因袭旧制度与习俗进行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他将天下传于自己儿子启已经是水到渠成，只需交接的过程了。《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淮南子·齐俗》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有扈……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启亡之”言启灭了有扈氏。）《尚书·虞夏书》中有《甘誓》，即记启灭有扈氏之事。

扫除儒家所散迷雾，由古代文献即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从炎黄时代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而近几十年地下挖掘的资料，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文化的正确认识，也有利于对“轴心时期”我国文化的繁荣及各种思想的来源、形成与发展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而举兵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舜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

远古时代由于人类无力治理河道,洪水暴发会淹没平原地带居民的房屋等生活资源,故先民多居于丘陵地带。西北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远祖生存栖息地之一。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如一年四季的变化,洪水的发作、消退,果实谷物的生长、成熟等)的逐渐掌握,防止河患能力的增强(局部的围堵、疏通等),人类慢慢向平原地带发展。古代传说伏羲“生于仇夷,长于起城”,“徙治陈仓”(《路史》。其说本荣氏《遁甲开山图》,见《路史·后纪一》罗苹注引),正说明了远古氏族生存、迁徙的一般状况。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7800年,已发现绳纹,则作为八卦前身的结绳纪事,具有了产生的基础。那么,作为远古时先民记数、记事、判断吉凶的“八索”,也应该已经形成。这就是八卦的前身^①。周人使用八进位制,这就同“八索”有关。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用十进位制,因为人的两手共十个指头,是人类最早的、与生俱来的计算工具;有的民族用十二进位,因为一年十二个月,这种进制起源于对一年十二个月事件的记载。周人最早用八进位制,涉及度、量、衡、历算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文献中有大量证据,只是学者们熟视无睹懵然不知而已。如:

“八尺曰寻,倍寻曰常”(《考工记·庐人》郑玄注,《左传》成公十二年杜预注),“八寸曰咫”(《国语·鲁语下》韦昭注)。《说文》:“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周尺也。”明言“咫”为周尺,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也是周人度制。

《国语·周语中》韦昭注:“十六斗曰庾。”又出土战国金文中有“料”字,学者们多释为“半”,实误。此乃是半庾之义,即八斗,为周人衡制之单位。八斗曰料,倍八曰庾,略同于长度单位之“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又据《仪礼·丧服》注,二十四镒为一升。二十四也是八的倍数。则八进位制在量制中也自成系统。

《汉书·律历志上》:“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又据《孟子·公孙丑下》:“一镒是为二十四两也。”

^①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言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索”即绳索之“索”。“八索”为远古时记数、记事之工具,后也因奇偶之数以示吉凶。为八卦的前身。参拙文《八进位制子遗与八卦的起源及演变》,刊《伏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周人的八进位制在历算中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湖北云梦出土秦简《日书》中的《日夕表》，便是将一天分为十六等分。一年中日、夕的变化，从“日六夕十”到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日五夕十一”，再恢复到“日六夕十”，按月变化，直至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日十一夕五”，再又一月月向日短夜长变化。秦人发祥于今甘肃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天水西南之地，周人最早发祥于陇东马莲河流域^①。后来周人东迁，秦人有周岐以西之地，“收周余民而有之”（《史记·周本纪》），形成周秦文化的交融，则秦人在某些方面也采用了周人八进位制。

“八节二十四气”民间至今十分重视^②，十六两为一斤，这种衡制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半斤八两”这句俗语至今活在语言中。则可见周人八进位制影响之深远。“八卦”的变化规则、卦爻辞及对这些进行解说的《易传》，组成《周易》。不仅八卦，整个《周易》的理论框架也同周人的八进位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八八六十四，为重卦，在远古周人应是整数。《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这是《周易》哲学体系中有关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周易》的很多理论基于此。

“八卦”固然是用来占卜的，但它起于记事，而且影响了我国上古时代的度、量、衡、历算等同生产、生活、科学研究密不可分的各个方面，又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充满了辩证思想的阴阳学说虽然其产生同我国先民从远古即主要以农业生产（由采集农业到种植农业）有关，但其系统化为一种思想方法，也应同起于“八索”的“八卦”从一开始即以奇偶示吉凶有关。中华民族美学思想中的“对称美”以及“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也无不与《周易》及其前身有关。与传说的伏羲时代相当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已发现刻画符号，这既是文字的滥觞，也是后代八卦形成的基础。今天我们看到的八卦卦画，是产生较迟的。由八索到今日之卦画之间，是数字卦，作

① 参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486—487页。

② 《周髀算经》下二：“凡为八节二十四气。”注：“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二十四气”即二十四节气，农历中是物候变化的重要坐标。

连山形,用“一”、“五”、“六”、“七”、“八”这五个数字组成。为什么没有“二”、“三”、“四”?因为这几个数在上古分别用两个、三个、四个“一”重叠来表示。恐相互间不易识别,故奇数有三个,而偶数只有两个。当时五作“×”,六作“Λ”,七作“十”,八作“八”,竖写如连山形。这其实就是古代文献中说的“连山易”。至今有不少学者对八卦的形成,八种卦画的来源以及“连山易”作出种种完全出于猜想的解释,其实都是向壁之说。

在上世纪的数十年之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学者们多能上溯至先秦时《易》、《书》、《诗》、《礼》、《春秋》,而能更上求其形成之基础与根源者并不多。研究儒家上至孔子为止,研究道家上至老子为止,研究墨家上至墨子而止,研究兵家上至孙武为止。其实,这些学术祖师的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老子上承容成,孔丘上承周公旦(当今学者多改为“姬旦”,误。先秦时男子称氏不称姓。秦始皇亦当称“赵政”,而不当称“嬴政”,新出土文献已证明之)。这样看来似乎中国文化发轫于春秋时期,此前似乎是一片空白。这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不适应的。近若干年中,李学勤等先生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的研究,张光直、余英时、陈来等对“前轴心时代”的探讨,使人们对我国春秋中期以前的历史有了较明晰的认识,在《周易》、《尚书》、《诗经》及《逸周书》、《国语》、《左氏春秋》、《楚辞》、三《礼》等文化元典的研究方面,在先秦诸子的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先秦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以至科技史、逻辑学等,一百多年来产生了大量具有开拓性、具有创见的论著。总的说来,成绩是巨大的。但应该重新研究、重新审视的问题尚多。在上下贯通、溯源辨流、打破旧有的藩篱、更准确地恢复历史真相方面,还有些工作可做;在消除经学、旧史学的束缚,同时又打通学科的界线,对先秦一些文学、文化现象作新的审视方面,也有些工作可做。因此,我们准备出一套《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如前所言,甘肃是伏羲氏发祥地。伏羲氏是远古一个氏族,有氏族就有氏族首领,所以在长久的传说中伏羲是指一个具体的人。关于这个氏族的延续迁徙情况,我们先不说,但文献中说的伏羲时代,确实代表了我国史前社会种植农业繁荣以前,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一

个时代。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天水西山坪一期文化、天水师赵村一期文化,都早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包括天水师赵村、秦安王家阴洼、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在内的不少文化遗址中,保存着丰富的仰韶早、中、晚各期文化,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的马家窑文化(年代为公元前 3300—前 2050 年),以及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大体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齐家文化,为弄清中华民族早期阶段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庆阳县董志塬、韩滩庙嘴等处的商代遗存,陇东灵台、泾川、崇信、合水、正宁、宁、庆阳等县,及天水、陇南一些县的大量西周文化遗址,以及布于甘肃很多地方的春秋战国文化遗址,如辛店文化(因 1924 年在临洮县辛店村首先发现而得名)、寺洼文化(因 1923 年在临洮县寺洼山首先发现而得名)、沙井文化(因 1924 年在民勤县沙井村首先发现而得名)、四坝文化(因 1948 年在山丹县四坝首先发现而得名)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和民族交融过程。尤其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秦早期先公先王及贵族墓葬群,使我们对秦国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周人、秦人都发祥于甘肃,都先后达到不同程度的统一局面,从而形成周王朝与秦王朝。周代的礼制、文化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秦王朝通过实行郡县制及“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其政体亦影响以后两千余年。而周秦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孕育最久、流传时间最长、传播最广的牛郎织女传说,并形成“七夕”节^①。这都是以前学者们未能注意到的。

近几年来在甘肃和全国很多地方出土大量刻画符号、陶文、文字资料及实物资料,不只是解决了一些学术上的历史疑案,使我们在有关先秦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所持的观念大大转变。在今天新的条件下,以一种新的观念来解读先秦时文学、文献,可能会发现以往不曾注意到的问题。

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经我省领导关心,于 2008 年在

^① 参拙文《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人文杂志》2009 年第 1 期;《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西北师大学报》2005 年第 6 期。

原西北师范大学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由省内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组成,而仍附设于西北师范大学。本省和学校领导对中心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一定共同努力,在这一套丛书中推出一些有价值的论著,以与学界朋友共商。希望得到学界朋友的批评与帮助。

2010年2月22日

序

赵逵夫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其著者当推儒、道、墨、法、兵、农、名、纵横、阴阳九家,而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相九州地理及山川形势,并及人及六畜的骨法度数)《汉书·艺文志》归于“数术”,医、房中、神仙归于方技,而考工(或曰“百工”)尚不在其中。认真研究起来,这些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早已蔚为大国,有的直至近代,其远流末裔形迹尚存。其中唯纵横家似在西汉中期以后即消失。但是其消失者只是出于政治目的或士人为争取进入统治阶层采取的活动方式,纵横家的理论著作《鬼谷子》中的心理学、交际学理论,则为封建专制社会一些有志于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策略。先秦诸子,有的侧重于思想观念的宣传及社会制度的设计,有的侧重于技能方术的探研。后一类人不可能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前一类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儒、道、法三家,而真正曾经进入统治集团、通过最高统治者掌握了政治权力的是法家和具有法家思想的人(管仲^①、李悝^②、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与纵横家(苏秦、张仪、范雎等)。影响最大的儒、墨、道三家,儒家当中,虽然孔子弟子中有几位曾仕于诸侯或卿大夫,荀况也曾为兰陵令,但除子贡外,均乏突出的

①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有《管子》。然而《管子》一书中法家思想十分突出。当然其中也有道家、儒家的因素。此书实为春秋到战国末年齐国管仲学派著作的总汇,其中部分为管仲所自著。

②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类首为《李子》三十二篇,班固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又《汉书·食货志上》:“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兵家”类又有《李子》七篇。清沈钦韩曰:“疑李悝。”又《史记》之《货殖列传》、《平准书》并云:“李克务尽地力。”《水经注》引《李克书》:“魏文侯时,克为中山相。”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魏文侯礼贤考》即认为李克即李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另有《李克》七篇,崔适《史记探源》曰:“悝、克一声之转,古书通用。”

业绩可述；墨家有个别人曾在诸侯或卿大夫家任小官吏；道家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六国之末及汉初持黄老之术者例外），不待言。而无论是抱着纵横家思想、策略以求用世的士人（如苏秦、张仪），还是从事有利于人主的策略研究的人（如鬼谷子），其实都没有形成一致的政治理想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法律、伦理、道法等思想体系。他们留给后代的有价值的只是心理学、交际学方面探索的成就，带有纯方法论的性质。名家的性质与纵横家相近（公孙龙也只是在平原君家作过客卿）。

相比较而言，作为法家集大成人物的韩非不仅有政治主张，而且同儒、道两家不一样，他认真地研究了社会心理学，研究了士人要走向政坛发挥政治作用应采取的方略。他不仅从法家各先驱人物思想中汲取了有用的方面，而且对儒家、道家也有所吸收，还从纵横家的理论著作中吸收了关于交际心理方面的理论。

法家之所以取得国君之信任掌大权而实现其政治理想，主要因为其思想合于六国中普遍存在的“一天下”的政治主张。西周亡后诸侯争霸七雄竞起，天下分裂五百年之久，对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妨碍。人心、天心都希望统一，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法家着眼于富国强兵，而且有些具体可行的政治主张。这不但在列国争强的形势下有利于统一政令、积力自强，在统一王朝的形势下，也利于避免各地拥兵自重、互相争夺以至威胁朝廷、造成内乱。考察韩非之前法家人物的思想主张，虽侧重点各不相同，而其学说的实质，莫不如此。战国中期的杰出法家人物李悝重农，吴起推行法治，废除贵族世袭制度、选贤任能，禁私门请托。其后商鞅着重讲“法”，申不害着重讲“术”，慎到着重讲“势”。至韩非而集前代法家之大成，提出一系列加强君主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方略。在当时形势下，韩非思想可谓应运而生，从先秦诸子形成之初，儒法两家就有些关联，有认识上一致的地方（如都重视君君臣臣的一套伦理制度），而到韩非之时，法家同儒家可谓壁垒分明，但最高统治者那里却如同手执双刃剑，运用自如，表面上大讲儒家仁、义、礼、智一套，骨子里是相信法家一套，交错为用，以利其事。

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确实具有两面性。但在历史上多受文人的非议，言其刻薄寡恩，与仁义相背，而少有言其法治之

说在稳定社会、严格吏治、抑制豪强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因为古代统治者中确实有些只喜欢韩非思想中专制驭下、严刑酷法、刻薄寡恩的一面；同时，历代统治者都以仁义为标榜，以法为用而以儒为名，儒表法里或曰阳儒阴法，在口头上则谤损韩非。所以历来学者对韩非的评价及韩非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情况，至为复杂。但总的来说，他的法制思想不仅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专政提供了政治理论的根据，也为后代的国家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理论资源。可以说，每一个稳定的社会，都要有法律作为保障；每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状况，也总同当时的政策及法治程度有关。而韩非提出的“法不阿贵”的严明执法精神，更为后代具有法治思想的政治家与循吏所继承。

从哲学思想层面说，韩非汲取法家、道家、墨家中有利于建立封建专制国家的学说，将它们统一起来；他虽然极力地批判儒家的仁义学说，但也吸收了儒家荀学中“性恶论”与“法后王”的成分。这些都统一于建立强大的专制国家这一点上。韩非认为“道”为各种规律体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韩非的文学思想或曰文艺观，前人大多只是看到他将儒家所提倡的文学列为“五蠹”之一，认为他排斥文艺，很多论古代文学思想的著作不提韩非，有提及的，也作否定论述，认为韩非“从功利的观点出发，对文艺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排斥态度”。能从韩非整个法制思想的方面看待其文学思想者少见。

我们要全面了解韩非的文学思想，首先得明白这两点：

第一，韩非著作中说的“文学”，乃是指学术文化，主要指儒家学说。《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又说：“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则“文学”指儒家学说甚明。所以，他提出“息文学而明法度”，乃是主要指废弃儒家的仁义学说，而彰明法度。

第二，韩非当时面对的是学术上的各家各派竞驰其说，而地域与方国方面，客卿游士立足于本身各言其事，也往往站在本国立场曲言设辩，故韩非对法家之外各说都持排斥态度。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所以他的历史任务是张扬建立统一强大封建帝国

的政治理论,并为此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尽可能协调的社会心理环境。他排斥儒家、道家、纵横家的学说,也包括排斥他们的文艺观。所以说,韩非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文艺理论,并不能反映他的整个文艺观。这可以由下面两方面看出:

一、韩非不是排斥所有的文学艺术。根据他的政治主张与主导思想,他排斥不合于法度的文艺作品,而合于法度的文艺作品,是允许存在的。《十过》中写师旷为晋平公奏清徵之乐,言“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平公强之,师旷乃“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垓;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可见,韩非是承认音乐的感染作用的,而且认为音乐的欣赏应同人的修养相应。

二、面对长期的诸侯割据、互相攻战的列国形势,为了尽快建立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本着节俭、有效、利于事的原则,他反对无益于生存和国家的政令、无益于富国强兵大方略的一切文艺形式、语言形式及设备、物件上的多余增饰。《外储说左上·说一》讲了一个故事:

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对曰:“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攄其坚,癸五寸,射稽二寸。

这里的评判标准只是看其影响及劳动效率的情况,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歌唱。从上面所举《十过》中例子看,韩非认为国君欣赏艺术美是应该的,只是要适当,并不一概而论加以禁止或否定。除了国君为维护君权的威力而具备各种艺术享受的权利之外,其他人都应从推行国家法令、积聚财物、富国强兵的方面考虑,不能有无益的虚耗。

可以说,整部韩非的著作,是应运而生的;韩非的思想,就是为建立统一、强大的封建帝国提供理论根据与思想方法的。不能把韩非的思想,把韩非的一些具体理论原封不动地用在以后其他社会条件下。

韩非的思想既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是万世不变的金科玉律。它能在六国之末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专制封建国家作出贡献已经很了不起了。韩非思想中重法制、执法一丝不苟、不阿权贵的精神,才是后代应该继承的宝贵遗产。古代一些暴君、酷吏在太平时期用韩非的一套整老百姓,是未能从特殊的历史时代上认识韩非及其思想。我以为后来之任何一个时代照搬韩非的思想来治世,都是错误的;不加分析地批判韩非及其思想,也都是错误的。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个社会条件、社会针对性问题,即使是正确的思想,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下也不能将其作法看作万世不变的真理。

既然韩非论著中所说有关文学的话都是针对当时具体社会环境与他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言,那么,韩非对文学的完整看法,可以从何得知呢?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所体现的与文学有关的方方面面,去了解他对文学的真正看法。

这同我们认识道家对文学的态度的方法一样。道家讲“无为”。《老子》中讲“行不言之教”(第二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章),《庄子》更是提出“绝圣弃知,”说什么“塞师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胠篋》),似乎是完全否定一切方面的着意训练、提高。但《达生》篇写一痾偻者承蜩,“犹掇之也”。孔子因而问:“子巧乎?有道邪?”痾偻者便言其长期坚持苦练以达到承蜩时手不颤抖的基本功的过程。可见,道家所谓“无为”,不是什么事也不干,什么也不经心,而是反对有悖于人的天性的礼仪说教,反对干扰人们正常生活生产的各种政令法律。由《养生主》中所写庖丁解牛的故事可知,道家最崇尚的是人的行为应合于自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人的生存环境应合于人的天性;那些强迫性的过度的行为,既出于自私的目的,又披着虚伪的外衣,有损于人的真诚的本性,是社会混乱的根源。他看当时的音乐、舞蹈,大约就像现在一些中老年人看声音刺耳、灯光迷离、舞姿古怪的流行音乐、流行舞蹈。韩非在文学上所持态度,与上述道家思想是相通的,是继承了道家,而与他的政治思想、法制思想结合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有机部分。我们要认识韩非文学思想的全貌,也可以同认识道家文学主张一样,由其文本本身所体现而观之(至今一些学者认为道家的文艺

思想是“无为”，否定各种文艺的形式。这其实是脱离了道家存在的社会实际及其学说的针对性，是误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马世年同志对先秦诸子之学深有兴趣，2002年考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学位论文确定为“《韩非子》研究”。韩非其人其书较儒道两家代表人物与经典，虽然研究者少，但两千年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还是产生了不少深入研究之作，各种校注本以外，专门研究之作也有十多部。故我们经过多次交谈确定以以往学者们不够关注或尚有进一步研究必要的几个问题为重点。经近三年的努力而完成。在通讯评议和答辩中，专家们对其中一些观点给予充分肯定。毕业后他又进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章培恒先生指导下完成出站报告《汉代各类诗体的流变》，后来又承担了内容相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8年我们决定出版《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他始回过头来将博士论文加以修改，定名为《〈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拟收入丛书出版。他请我作序。结合专家们的看法，我以为该书在几个方面有所创获：

一、《史记·韩非列传》中载韩非使秦仅一次。本书根据《史记》、《战国策》及《韩非子》一书中有关材料，考定韩非生平中曾两次出使秦国，第一次在秦始皇十年，第二次在秦始皇十四年，《史记》所载为第二次，他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存韩国。这对于理解和评价韩非的思想与人格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书中还就韩非的身世与生卒年代、求学经历、死因等问题作了补证。

二、关于《韩非子》的成书，本书认为，韩非去世之后其门徒整理师说，汇为一编，这是《韩非子》编辑的第一阶段。汉初，研习韩非学说的人较多，其中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中秘书）者，有人将《初见秦》、《存韩》等档案文书编入韩非著作集中，其时间应在武帝建元元年罢黜申、商、韩非诸学说之前。这是《韩非子》编辑的第二阶段。司马迁所见就是这个本子，其面貌已与今本很接近。司马迁之后，始有“《韩子》”之书名。至刘向为《韩非子》作了《书录》，此后便再无大的变化。

三、本书在充分吸纳以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韩非子》各篇重作考察，确定《初见秦》、《有度》、《十过》、《问田》、《人主》、《饬